

R.G

[法] 雅克·哈尔斯特里克

[法] 法博利济奥·卡勒维

唐伯新 / 译

李东 / 校

无所不用其极

法国普通情报局内幕



法律出版社

www.lawpresschina.com

无所不用其极

——法国普通情报局内幕

雅克·哈尔斯特里克
〔法〕 法博利济奥·卡勒维 合著

唐伯新 译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所不用其极：法国普通情报局内幕/(法)哈尔斯
特里克，(法)卡勒维著；唐伯新译，—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0.9

ISBN 7-5036-3209-7

I . 无… II . ①哈…②卡…③唐… III . 情报机
构-活动-法国 IV . D756. 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652 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陶松

责任校对/杜进

印刷/北京宏伟胶印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60 千

版本/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甲 105 号科原大厦 A 座 4 层(100037)

电子信箱/pholaw@public.bta.net.cn

电话/88414899 88414900(发行部) 88414121(总编室)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3209-7/D · 2928

定价:1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法文原著：

- △书名:《R. G.》(即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的缩写字母——译者)
20 ANS DE POLICE POLITIQUE
- △作者:JACQUES HARSTRICH
FABRIZIO CALVI
- △出版社:CALMANN-LEVY
(卡尔曼—雷维出版社)
- △出版年月:1991 年 3 月
- △中译文约 15 万多字

序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见《孙子·用间篇》）情报活动古已有之，现代国家更需要掌握一套精良的情报手段和高效的情报系统，法国也不例外，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国人对法国“普通情报局”可能比较陌生，但在法国，一提起“RG”（“普通情报局”的缩写，现称情报总局，缩写为“SCRG”），人们皆为之侧目。“普通情报局”实际上极不普通，它在法国情报系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其历史悠久，而且它是历届政府手中的一把利器，是庞大专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通情报局”素有政府“耳目”之称。它为获取重要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报而无所不用其极，电话窃听，密检信件，监视跟踪，派遣鼹鼠等手段不一而足，报刊时有披露。但同任何情报部门一样，“普通情报局”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局”外人很难窥其全貌。

读者手中的这部《无所不用其极——法国普通情报局内幕》，是法国近年来有关该情报局全面情况的权威之作，出版后立即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该书具有三个鲜明特征：其一，作者系普通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其身份非一般记者或学者可比；

其二，作者以罕有的“坦率”，记述了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普通情报局为达其目的而采用的种种手段，并非杜撰和臆测，有其特有的可信性；其三，本书的年代跨度较大，作者通过对情报工作的记述，为我们展示了法国近三十年来政局和社会演变的五彩斑斓的画面，不失为一部研究法国现代史的重要辅助书籍。鉴于此，本书不仅对我国广大政法工作者，而且对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高等院校的学生，都会有一定参考价值。普通读者也可从中领略到不少惊心动魄的史实。

本书译者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对法国和西欧情况的调研工作，并两度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法国问题专家，且译著较丰。我与译者交往甚笃，本书译出后得以先睹为快，深感有责任推荐给广大读者。

是为序。

束 啓 德

1996年2月于北京

译者的话

“普通情报局”(RENSEIGNEMENTS GENERAUX)系法国主要情报部门之一，隶属内政部，记者称之为“法国政府的重大耳目”，其基本任务是“收集并向政府报告凡具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性质的情报”，供政府决策时参考，是典型的“政治警察”。该局通过特殊手段和途径，曾准确预报 1968 年“五月风潮”、1981 年 5 月密特朗当选总统、1992 年 3 月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同年 9 月 20 日马约问题公民投票以微弱多数通过等等，其预测的可信性远远高于一般民意测验机构。

据法刊透露，“普通情报局”现约有 3800 名特工，除设在巴黎的总局外，在全国 22 个大区、103 个省和 229 座城市均有分局机构。该局无孔不入，政党、工会、团体、学校、企业、传媒、机场、港口、集会、游行等等均为他们搜集情报的对象。他们输入电脑或手写的法国人档案卡片约 90 万张，涉及全国 1.6% 的人口，卡片记有当事人参加的“政治、哲学、宗教或工会活动”情况，省情报局档案卡还记述当事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起的明显作用”，是否参加过竞选、当选过议员没有。“普通情报局”活动范围广泛，除进行民意调查、撰写社会形势报告、每次选举都作出结果预测外，还负责监控赛马和赌博、驱逐非法移民、打击黑工、监视原教旨主义者的清真寺、反恐

怖活动、追踪国内外可疑人物等。该局为获取情报，往往不择手段，故常常引起外界的非议。

1990年10月，“普通情报局”专案组跟踪侦查的杜塞牧师突然神秘失踪案引发了一场指责以至要求撤销“普通情报局”的运动。在此背景下，曾于1981年时任该局总监的雅克·哈尔斯特里克以回忆录形式于1991年3月出版本书，历述自己在该局二十年的“政治警察”生涯。他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不仅追述了当年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而且直言不讳地谈及“普通情报局”为获取情报而使用的安插鼹鼠、操纵内线、电话窃听、私闯寓所、截拆信件等各种手段。此外，书中还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法国官场、各警察部门、各情报部门以及法国同外国情报机构之间勾心斗角、沽名钓誉等种种错综复杂情况。该书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认为终于揭开了“普通情报局”的神秘面纱，令公众窥探到该局的一角内幕。

本书事件繁多，情节曲折。从侦破暗杀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总理案，到逮捕或驱逐学运领袖热斯马尔和科恩—邦迪；从监控商人运动、逮捕并利用他们的首领尼古，到破坏利普手表厂的工人运动；从营救被绑架的法国考古工作者克洛斯特尔，到打入法共；从情报局日常活动，到完成各项“特殊使命”（如教训以色列人……）。这一切故事，由作者讲述出来，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读来饶有兴味。

本书主要作者哈尔斯特里克1925年生，1945年进入警界，1954年起任国家安全局探长，1960年升任警官，1962年调进普通情报局，在其倡议下，成立了“地区行动大队”，1969年升为“主警官”，1973年晋升为副局级警官，1979年起任塞纳—圣德尼省普通情报局局长，1981年任普通情报局总局总

监，1983年调全国警察总监察局任职。另一名作者法博利济奥·卡勒维为著名记者，著有《七七年的意大利》、《P38同志》、《黑手党的日常生活》、《各国秘密情报机构》、《秘密军队组织——法国的秘密战争》等书。

作者著此书旨在为普通情报局进行全面辩护，故书中不乏美化该局之处，请读者察鉴。书中涉及之所谓“无产阶级左翼”，他们的言行当由自己负责，亦无须赘言。为便于阅读，译者加了若干注释。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误，敬请读者诸君指正。

导　　言

普通情报局是秘密警察组织吗？

普通情报局(RENSEIGNEMENTS GENERAUX)*虽以观察法国社会和政界为己任，然其做法却有别于拉美国家任何政治警察组织。本人在情报局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因而对此特点坚信不疑。我亲历第五共和国以来最黑暗岁月，尽管我们五花八门的做法(诸如安插坐探、电话窃听、非法搜查、截拆信件等等)似乎不无争议之处，但我可以断言，这些手段用来对付对手，不论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杀手，还是对付极左派中图谋搞恐怖主义的人，都行之有效。

有些警察因缺乏教育或步入歧途，因而使用了非常不正当的手段，成了害群之马。但绝不能因此就重炮猛轰情报局。前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博内声称，给情报局抹黑可耻。此话言之有理。某党前领导人弗朗索瓦·莱奥塔尔**本人及其朋

* 为行文方便，本书中凡出现“普通情报局”处，均简译为“情报局”。——译者

** 弗朗索瓦·莱奥塔尔：前共和党主席。——译者

友们均曾受益于情报局，现在却提议取消这个警察机构。博内对此感到沮丧，难道我们没有同感吗？雅克·希拉克^{*}谈及左翼执政后利用情报局时，硬说法国国家机器因此“误入歧途”。为此，我们怎能不提醒他注意，他领导的政府难道没利用、甚至滥用过情报局吗？

约瑟夫·杜塞失踪并惨遭杀害，桑杜里私人保安公司搞非法窃听，迪富尔警官所做耸人听闻的“披露”，这一连串事件成了1990年秋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公众舆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情报局。民选议员，其中包括反对党议员，纷纷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既然戴高乐派、德斯坦派以至中间派等反对党虽曾执政二十余载，现在也竟然群起攻击这个警察机构，反对它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追溯几桩历史事实吧。

从第三共和直到1940年，有一个对行政和铁路警察进行监督的机构。在该机构中工作的是特别警察局的警官和侦查员。这些官员不仅要向本部门领导、而且还要向其驻在地区的省长报告本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并监视可疑团体和外国人。维希政府对这个全国警察机构没有触动，并以“情报局”之名称保持到法国解放。第四共和国领导人充分利用过情报局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收集的各种情报。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后并未改变国家机构，其后蓬皮杜、德斯坦和密特朗相继领导的第五共和国均保持了对情报局的领导。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情报局呢？为什么要偏偏选中被记者戏称为“政府重大耳目”的警察机构呢？干警察这行，原则上讲

* 雅克·希拉克：前内政部长、总理、保卫共和联盟主席，现共和国总统——译者

是个人追求的道路。选择标准不一而足，有的出于个人喜好，有的为就近上班，而可供选择的大局有四个，即领土监视局、刑警局、城市警察局和情报局。此外还有四个处，即高保处、共和保安队、国际警察技术合作处和机场边防警察处。我在上述四个局均供过职，因而可以证实各局使用的警察技术手段都大同小异。

杜塞事件^{*}发生不久，报刊以及某些政治领导人装出一副仿佛刚发现情报局存在的样子。某些人甚至妙笔生花，说情报局是法国的特产。他们无理断言，说欧洲绝对没有类似的情报组织，在英国和意大利，政治情报归口于反谍报局，甚至归刑警局管。其实，他们对英国的“特警局”(SPECIAL BRANCH)、意大利的“特殊事务局”(AFFARI RESERVATI)、比利时的“国家宪兵队”(GENDARMERIE NATIONALE)以及德国的“宪法保卫局”(DEFENSE DE LA CONSTITUTION)知之甚微。实际上，所有国家都有政治情报部门。

再者，即使将政治情报归口于反间谍部门或刑警局，也不能改变其性质。这两个特殊部门原则上都置于司法部门监督之下。尽管法官大人业务精湛、兴趣广泛，但同搞政治的人相比，究竟谁能对政治情报作出最正确的评估呢？在这方面，似乎是内政部长最能对是否适时利用已获得的情报作出判断。至于对情报局的监督问题，既然现行机构(全国警察总监察局IGPN 和巴黎警察总局总监察署 IGS)已不断表明工作成效卓著，那又何必另起炉灶呢？

* 杜塞事件系指被情报局“特别调查组”跟踪监视的约瑟夫·杜塞牧师于1990年失踪，同年10月18日发现他已被暗杀身亡。——译者

内政问题不属领土监视局(DST)职权范围。法国是一个人民行使全权的法制国家。除非共和国处于危险时刻(如必须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等等),否则反间谍部门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在法国本土和海外省搜寻外国谍报人员。唯有在法侨有可能为某某外国效劳时,领土监视局才关注这些法侨。

政府掌握一个能摸准民众脉搏、能对积极参与国家公众生活的公民或对从事武装斗争反对国家体制的公民进行调查的工具,看来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情报局的作用所在。

东德的“斯塔吉”、罗马尼亚的“安全局”、苏联的“克格勃”,以至海地总统的嫡系亲兵,它们始终在本国国内搞得人人自危。我们怎能把法国情报局同它们相提并论呢?即便把这些组织称之为“政治警察”,那么谁又能确有把握地说,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为法制国家效力的警察呢?

法国情报局警官让一马克·迪富尔负责物色密报员,有一次竟然在物色对象的门上开枪,这种作法既愚蠢又不可取,成了情报局的一桩丑闻。除这种奇怪作法外,他还违背情报局的手则,没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如实报告调查到的各种情况。显然,他的专业素质还有待提高。这位忠于职守、随叫随到的警官似乎应该想到办了几件漂亮的案子后自己已是优秀的警官之一,更应谨慎从事才对。他未经考试便从调查员升为侦查员,并按自己选择的道路逐步擢升。但他逐渐不受上级管束,随心所欲报告,绝口不提违反职业道德情况并文过饰非。

难道由此便大声疾呼,反对整个情报局吗?内政部长、社会党人皮埃尔·若克斯于1990年正确地指出,个人的越轨行

为和过错，绝不能被用来当作指责整个部门的借口。某刑警在搜查过程中偷拿一张彩票，里昂市警察局某些官员组织起一个犯罪团伙，难道我们便因此而否定这两大警察机构吗？不行，因为在这两个局中工作的警官、侦查员、调查员，几乎所有人都异常勇敢、极其光明磊落地从事着自己的职业。

情报局是“秘密警察”。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情报局百分之九十五的活动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情报局只是使那些武装斗争的信徒、受金钱腐蚀的政客以及滥用法国给予的避难权、企图搞武装行动的外国人感到坐卧不宁。同时，情报局掌握的大量情报绝不会使守法公民受到困扰，无论这些情报系个人调查所获，或是在较广泛范围内取得的。

情报局的工作在法国鲜为人知。情报局对每位参加政治性选举的候选人都进行调查；得到国家资助的企业的老板在被任命前要经过情报局的调查；对筹建中的某委员会、某团体，情报局也要进行调查。这些情况，诸君是否知道？无论如何，省长要向政府报告本省发生的情况，情报局不提供情况，他们能有什么作为呢？同样，对于任何想会晤高级官员的记者或普通公民，能不进行最起码的调查吗？这就要求情报局写出该人的简历。所有这一切都旨在把好关。就我本人而言，除非为便于回忆报纸上提到过的案件，我从不在笔记本里记载纯属他人私生活或判刑后又被赦免者的情况。通常作法是，把这些情况记在活页纸上，一旦局长要求撤出，则可随时销毁。我不揣冒昧地希望我的同行也采取同样作法。

一份很普通的情报，只要善于利用，则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情报局应就国家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情况，向政府提出报告。收到这些情报的人如何加以使

用，不应反过来谴责已经作的收集情报工作。提供情报与如何综合利用情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例如，我记得在 1967 年，情报局“社会处”曾呈给内政部长一份题为《大学生行将使用暴力，造成革命形势的诸因素业已具备》的备忘录。估计这份备忘录又转呈给了总理和总统。然而，它没起任何作用。当时，似乎唯有情报局局长亨利·布古瓦朗意识到了正在酝酿中的事件的严重性，他要求我放下手头的所有案子，转而密切注视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政权机构又如何呢？不久，当发生 1968 年五月风潮时，我们就看到它们是多么束手无策、多么软弱无力了。

警察这个职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时，会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试图通过全国警察的会考。报考者中间有很多人拥有学士学位。因招生人数有限，无奈之下大多数人在考警官科目失败之后便蜂拥报考侦查员。有些大学生从此当上了保安队员或调查员。于是，某些人产生了“失落感”，这可能助长灰溜溜或怨恨情绪。他们很容易想到，长辈的领导观不行，应来个观念更新，殊不知自己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往往酿成大错。与基层这种犯上心理同时存在的还有上层不敢管的危机。我感到，上级领导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竟容忍某些不能苟同的越轨行为。

我初在行政部门工作时，曾碰到一些上级领导，他们确实多少有些专断，但至少部门领导非常重视每个探警向他们诉说的困难与过失。今天，不少部门的头头和属下之间不再有信任关系，部门领导不再向属下提出忠告，于是为各种违章犯法行为敞开了大门。

这种说法有真凭实据吗？有。各级警官、警察泄露的秘密

泛滥成灾。这些秘密往往似是而非，或真假参半，为的是不便追查或暴露材料来源。这种态度令人震惊。不久前，有些来自情报局的情报被泄露出去是应一时的政治需要，其中有的竟来自内政部长办公室。相反的极端作法是杜撰情报。迪富尔警官声称，他的上级曾让他给某部长提供男妓，以便毁掉该部长的前程。这种无稽之谈怎能令人相信呢？即便没有最低限度的顾虑，起码的谨慎小心也会令科长、处长或局长不敢轻易自主下达这种指示。有哪位内政部长竟能容忍对国家元首和总理选中的政府成员干出这种勾当呢？

迪富尔的这种妄言非但不能使人更好地了解情报局，反而使人更加怀疑情报局是个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机构。虽说情报局的某些分局（例如巴黎警察总局情报局）在运作方面有时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说它们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警察机构。

这场诽谤运动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写本回忆录。但写作时我要避开两个暗礁。其一是为暴露而暴露，但其中谎话连篇。我本人反对这样做。其二是虚伪地遮遮掩掩，装得道貌岸然。我决定赤裸裸地合盘托出在为前后几位迥然不同的内政部长（如罗歇·富雷、雷蒙·马赛兰等）效力期间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操纵内奸、进行搜查和窃听的方式。这样做旨在使大家了解情报局日常活动的真相。书中有些人物的名字我不得不略而不谈或为他们取个代号。这是出于最起码的谨慎，否则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至于全书的其他部分，我相信，与其因保守机密而令人疑团丛生，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用第一手材料揭示我本人直接卷入的各种事件，这会是对谣诼的最光明正大和最有效的回击。凡对情报局使用的方式和手段感到

震惊的人迟早会意识到，唯有谨言慎行和有共和思想的国家公职人员才能用这些方式和手段为维持公共秩序服务。情报局作为工具，本身并非不祥之物。一切取决于如何培养教育使用这一工具的人。